

历史等社会科学的功用应是“资政育人”

——兼论发布重要文献不宜使用“咨政育人”

○ 苏成爱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人们谈论历史、非遗等社会科学的作用常常会用到“资政育人”一词,这是由于多位前任或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书信以及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件中频繁地使用的缘故。最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把“资政育人”写成“咨政育人”。经文献学的考察得知,媒体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书信等重要文献或作“资政育人”,或作“咨政育人”,而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留下的书面材料用的是“资政育人”,不是“咨政育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党和国家领导人用“资政育人”是规范准确的,而“咨政育人”是不规范的,亟需纠正。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理解并更加有效地发挥历史、非遗等社会科学的作用。

[关键词]历史的作用;资政育人;咨政育人;准确写法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4.010

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成果都具有“资政育人”的作用。但是,最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改用在2002年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咨政育人”来代替“资政育人”。^[1]究竟何种写法正确?抑或是两种写法皆可?曾有学者讨论“资政”与“咨政”哪种表达孰为正确的问题,或谓“资政”正确,^[2]或谓“咨政”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与之通用。^[3]我们则认为:“咨政”自古以来就有数量极少的用例,不能断定它是完全错误的,但与“育人”连用时只能是“资政”,“咨政育人”是不规范的搭配。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咨政育人”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主要是源于媒体在发

作者简介:苏成爱,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组子课题负责人。

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述的重要文献中频繁使用该词的缘故,而实际情况是,只有用“资政育人”才符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本意。

一、重要文献中的“资政育人”与“咨政育人”

媒体发布的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以及诸多相关党政文件都曾经频繁使用“资政育人”或“咨政育人”,相关情况较为复杂,但经梳理,不难发现这两个词语的使用情况和规律。我们发现,这两个词最初的使用分别源于媒体发布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书面材料和讲话材料。为便于表述,我们根据用词规律和因承关系将相关用例整理为 A、B、C 三类:

A 类,用“资政育人”一个词,或用“资政育人”与“以史鉴今”两个词来共同说明党史工作的任务和作用:

A1. 1998 年 11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布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同年 10 月 22 日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亲笔信:“我希望各级党委重视党史工作,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是为“10·22 亲笔信”。

A2. 2001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全国党史部门、广大党史工作者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说法可能是为了贯彻“10·22 亲笔信”(A1)精神。

A3. 2010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发〔2010〕10 号文件)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坚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做好党史工作。”

A4. 2010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对全国党史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A3)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89 年来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颁发的党史工作文件,习近平正是为了贯彻这一文件才发表 7·22 讲话的。

A5. 在习近平发表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A4)而作出 7·22 讲话以后,各省省委迅速做出反应,印发了相应的文件,各省省委的文件无一例外地都使用了“资政育人”。

A6. 2011 年 2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二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出席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代表时的讲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史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认真贯彻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实好,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A7. 2011 年 6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认真学习党的重要文献,充分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A8. 2015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栗战书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肩负起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这显然是在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

B类，用“资政育人”等五个词共同说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五大作用：

B1. 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的讲话：“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是为7·16讲话。其中，“资政育人”一词在此前任何文献中都未曾出现过。

B2. 为了贯彻江泽民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7·16讲话精神，2002年9月13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教社政〔2002〕10号）：“（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在承担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职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B3. 为了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2003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教社政〔2003〕1号）：“要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B4. 2003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不断作出新的建树。”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

B5. 为了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B6. 2004年7月1日《浙江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省社科院省社科联调研时的讲话：“繁荣和发展我省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

B7. 2006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发布前一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界一定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

B8. 2011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

学,使之更好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这显然是在贯彻江泽民7·16讲话精神。

C类,用“咨政育人”等四个词共同说明我国文化遗产的四大作用:

C1.200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前数日在北京考察文物工作时的讲话:“要高度重视文物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的作用。”

C2.2010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日在北京考察文物工作时的讲话:“文化遗产事业在保护中传承、在开拓中前进,有效发挥了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的作用。”

二、重要文献中“资政育人”与“咨政育人”的源流考证

有必要首先指出的是,以上由媒体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的“咨政育人”和“资政育人”语例,无论使用的是哪一个词都不能不经过考证而直接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如,同样是发布习近平的讲话,2010年7月22日(A4)、2011年2月27日(A6)、2011年6月17日(A7)媒体用的是“资政育人”,2004年7月1日(B6)用的是“咨政育人”。

A类,说明党史工作的任务和作用,一般使用“资政育人”一个词,或同时使用“资政育人”与“以史鉴今”两个词。“资政育人”一词,1998年11月17日媒体发布的江泽民10·22亲笔信(A1)是在重要文献中最早书面使用的,也是目前唯一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书面使用该词之后经媒体发布的重要文献。如果这则亲笔信发布无误,那么只有这则亲笔信才是唯一能够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见的文献。

在1998年以前,习近平和胡锦涛都使用过“资政育人”,其他人也曾使用。据1991年发表的《宁德地委作出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决定》一文披露,1990年中共宁德地委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党史工作担负着“资政育人”的重要任务。^[4]值得注意的是,时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是习近平,文件中“资政育人”一词极有可能是习近平亲笔所拟。胡锦涛在1994年的一次讲话中用过“资政育人”一词。^[5]其他人也曾使用,如1988年第9期《福建党史月刊》就发表了题为《强化地方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的文献。据我们检索,在1998年以前用过“资政育人”的文献超过100篇,但从未出现过“咨政育人”。

在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我们暂时无法考证出是哪位最早使用了“资政育人”,但是江泽民1998年在10·22亲笔信中的书面使用和口头上多次使用在过去的影 响是最大的。此前虽有人使用过这个词,但这个词的广泛流传无疑是导源于江泽民的10·22亲笔信。江泽民的10·22亲笔信也是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献中最早书面使用和目前唯一书面使用过“资政育人”的,代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除了江泽民的10·22亲笔信之外,其他用例都是媒体发布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提到的。江泽民亲笔信的原件现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般人无法一睹真迹,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大楼大厅的屏风上刻有依照江泽民真迹制作的放大的亲笔信,上面分明用的是“资政育人”而不是“咨政育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铁证”。

B类,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五大作用,使用“咨政育人”与“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服务社会”五个词。“咨政育人”于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江泽民7·16讲话(B1)中才首次出现,这是在重要文献中所能找到的最早用例,也是在所有的文献中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应用例。语例B2-B8述说了社会科学五大作用所用的五个词不仅完全相同,而且语序也完全相同,显然都是受到了媒体发布的7·16讲话(B1)的影响。

C类,说明文化遗产的四大作用,使用“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四个词,这四个词连用于2006年4月29日媒体发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讲话(C1)中首次出现。语例C1、C2说明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都用了“咨政育人”“传承文明”,这两个词也是在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江泽民7·16讲话(B1)中首次出现,显然是受到发布7·16讲话影响的结果。所以C类语例也受到了媒体发布的7·16讲话(B1)的影响,B类、C类都可以归为同样使用“咨政育人”的一大类,所有的“咨政育人”用例的最初根源是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7·16讲话(B1)。

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布了7·16讲话以后,有关部门不久就根据这个发布制定了多个文件(B2、B3、B5、B8),文件下发以后,使用“咨政育人”的人越来越多,有习非成是趋势。

我们认为,“咨政育人”属于2002年7月17日才在《人民日报》首次出现的不规范和不准确的汉语词汇,而“资政育人”属于1998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的规范和标准的汉语词汇。

“资政育人”一词的广泛流行源于1998年10月22日江泽民的书面使用,更早的渊源是方志的“六字功用”说、《资政通鉴》诸书之说等:

党史、一般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作用,人们常常都借用“保存史料、资政育人”的说法来说明。“资政育人”的提法显然是受到了前人所说的方志功用的有关提法的影响。古代方志是一地之史、“辅治”之书和“资政宝鉴”。关于方志的功用,古语习称为“资治、教化、存史”,即“六字功用说”。^[6]当代方志界基本沿袭了此说,只是略加变化,把“资治”改为“资政”,把“教化”改为“育人”,并进一步归纳为“保存史料,资政育人”。^[7]当然,“资治”的说法可以溯源到年代更早的《资治通鉴》等书。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著名史书,记载了自战国至后周16个朝代的历史。这部书是历代帝王的教科书,也是现代政治家的教科书。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资治通鉴”,司马光称此书“鉴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即“以古鉴今”，而“资治”又是“资政”的同义词，包括方志在内的史书都还兼有“育人”的作用，故历史的作用常被概括为“以古鉴今、资政育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频繁使用的“以古鉴今、资政育人”显然是受到了政治家教科书《资政通鉴》的影响，所以我们发布他们的讲话只能使用“资政育人”而不能使用“咨政育人”。

《资政通鉴》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后世类似的书名一直不断涌现，大多把“资治”改为它的同义词“资政”。清顺治帝酷爱《资政通鉴》，他主编的《资政要览》采集了古代嘉言善行的记载，用来帮助当时及后世的执政者为政。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备陈方策”“以资国政”，撰成《资政新篇》。“资政”一词后来比“资治”更为流行。

三、“咨政育人”与“资政育人”的语言学辨析

(一)从字义来看，“咨”“资”二字之义迥异。

要想弄明白究竟是“咨政育人”正确，还是“资政育人”正确，抑或是二者都正确、可通用，这要从“咨”“资”二字的本义说起。

“咨”“资”都是形声字，读音相同，其声符都是“次”，但义符不同，“咨”从“口”，本义是指口头上的“咨询”“商议”；“资”从“贝”，一般不指口头上的行为，贝是古代的货币，“资”的本义是“钱财”。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通常情况下，帮助别人最重要的和最普遍的做法是给予别人钱财，所以“资”又引申为钱财方面的“资助”；但有时钱财以外的“资助”作用也很重要，于是“资”进一步引申为所有类型的“资助”，即“帮助”“辅助”。如《史记·项羽本纪》“愿大王资余兵”。再如，《逸周书·大聚》“资丧比服”，朱右曾集训校释：“资，助也。”《文选·任昉〈奏弹曹景宗〉》“缓救资敌”，张铣注：“资，助也。”

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字是借字。现代人们使用的成语大多源自文献，这些成语中有不少还保存着借字，如“一暴十寒”的“暴”是“曝”的借字，“受益匪浅”的“匪”是“非”的借字。如果“资政育人”之“资”是“咨”的借字的话，那么“资政育人”就可以写成“咨政育人”，但这种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前文已揭，“资政育人”中的“资政”，其前身是“资治”。其中的“资”是“帮助”之义，不是“咨询”之义，所以这里的“资”不能写成“咨”。

(二)从语义与语用来看，我们只能说“资政育人”。

1. 从著名史书《资政通鉴》的命名来看作为“资政”前身的“资治”之“资”义。

北宋司马光等人耗费近 20 年的光阴编纂而成的《资政通鉴》是我国最为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至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16 个朝代 1362 年的历史，凡 294 卷，计 300 余万字。这部书后来不仅是历代帝王必读的教科书，也是士人们心目中的“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更是

现代政治家的教科书。“资治通鉴”之“鉴”，义为“镜子”，《资治通鉴》实际上就是一面帮助帝王为政的大镜子，其英文译名一般是“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mirror”（鉴）就是“镜子”的意思，“aid”（资）是“帮助”“辅助”之义。此书原名“通志”，宋神宗以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为“资治通鉴”。所谓的“有资于治道”即有助于治道之义。“有资”“资治”之“资”都是“帮助”“辅助”之义，不是“咨询”之义，因而不是“咨”的借字，“资治”不能写作“咨治”；而“资治”又是“资政”的前身，所以“资政”不能写成“咨政”。

2. 从深受《资治通鉴》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常将“以史鉴今”与“资政育人”连用情况来看“资政育人”之“资”义。

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指出，中共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这是十分符合事实的。当日习近平的讲话中就三次用到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早在2003年8月14日习近平就强调了历史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8]胡锦涛在1994年11月21日、1999年11月24日^[9]、2001年6月30日的数次讲话中都强调过历史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2011年9月初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党史军史工作的意见》都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坚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够帮助人们通过对照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来寻找治理好国家政治的大政方针，对政治家具有不可替代的帮助作用。总字数达300余万字的《资治通鉴》就是一面帮助政治家为政的大镜子，它是历代“帝王教科书”，更是现代政治家教科书：毛泽东一生至少读过此书17遍，邓小平也是终生爱不释手，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也都曾屡屡引用。

《资治通鉴》书名中的“资治”实际上就是“资政”的意思。宋神宗称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有资于治道”即有助于治道；主编司马光的意见与此完全契合，他说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常被概括为“以古鉴今”，而“资治”又是“资政”的同义词；而包括方志在内广义的历史还兼具“育人”的作用，所以历史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古鉴今、资政育人”。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屡屡使用的“以古鉴今、资政育人”显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家必读书《资政通鉴》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发布他们的讲话的时候只能用“资政育人”而不能“咨政育人”。

“资政育人”之“资”是“帮助”之义，而非“咨询”之义，不会是“咨”的借字，故而“资政育人”不能写成“咨政育人”。

3. 从深受《资治通鉴》影响且以“资政”冠名的古书来看“资政育人”之“资”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古鉴今、以史资政的传统。《资治通鉴》影响巨大，后世类似书名不断涌现，其中不少书名都是把“资治”改为它的同义词“资政”。如

酷爱《资治通鉴》的清顺治帝福临就曾经主编过《资政要览》一书,该书是采集诸书中有关于政事与修身的资料而编写成的帝王教科书。福临亲撰序言云,“帝王为政,贤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学”“凡古人嘉言善行载于典籍者,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于今者也”,所以此书采集了古代嘉言善行的记载,以期帮助当时及后世的执政者为政。书名中“资政”之“资”亦为“帮助”之义,也不能写成“咨”。

我国以史资政的传统,在近代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开启了以当时之史资当时之政的风气,不再局限于以古代之史资当时之政。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主要领导人是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他于1859年撰写的《资政新篇》,是洪仁玕本人治国理政的实施纲要,是以建议的方式逐条向天王洪秀全提出来的。洪仁玕认为“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所以他根据自己在上海与香港时对于西式资本主义的见闻,条分缕析地“备陈方策”“以资国政”。所谓“资政”即“以资国政”的略语,亦即他所说的“为政必有取资”,这里的“资”显然都是“帮助”“辅助”之义。他说自己撰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辅国政”,即帮助和辅助国政。洪仁玕在书中还声称:创办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览之,得以资治术”“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恭录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汇成小卷,以资圣治,……以辅圣聪不逮”。这些语句中的“资”与书名中的“资政”之“资”显然都是“帮助”“辅助”之义,都不能换成义为“咨询”的“咨”字。

4. 从“资政”的用例来看“资政”之“资”义及“资政”与“咨政”语用色彩。

“资政”是由来已久、约定俗成的传统说法,意思是“助政”“辅政”。唐人释道宣《叙元魏太武废佛法事》云:“帝讳焘,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时年八岁,尚在幼冲,资政所由,唯恃台辅。”说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时年仅八岁,帮助处理政务的是当时的宰辅一类的高级官员,“资政”即“助政”“辅政”之义。这些帮助为政的资政者对于小皇帝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极为重要的。

“资政”还指名义上或实际上承担“助政”“辅政”之责的官职。这类官职通常是由原本官阶极高的退休官员担任。虽然他们大多只起到“备咨询”的边缘性作用,但都叫“资政”而不叫“咨政”,因为“资政”是“助政”“辅政”之义,“助政”“辅政”必不可少、极为重要;“咨政”是就政务问题进行咨询的意思,“咨询”可有可无、并不重要。所以,“咨政”是具有口语色彩的中性词,“资政”是较为文雅的褒义词和书面语,与“咨政”相比,“资政”更能体现出国家对这类官员的恩宠,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的表现,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

宋代开始设置“资政”一职,全称是“资政殿大学士”,主要由德高望重的退休宰相担任,地位崇高。金、元、明、清、民国都设这一官职,并沿用“资政”之名。近年来,我国湖北、河北、四川等地聘请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副省级官员为“资政”,但都不叫“咨政”,可谓古风犹存。新加坡的国民主要由华人组成,该国政府曾经一度设有“内阁资政”和“国务资政”等“资政”职位,都由卸任的总理

或卸任的副总理担任,位高且权重,在内阁中的地位仅在总理(Prime Minister)之下。其中,内阁资政专责为新任总理提供指导,起到帮助、辅导新手的作用。内阁资政英文名称叫做“Minister Mentor”,意为“指导部长”。“Mentor”在英语中的意思是“(无经验之人的)有经验和可信赖的指导者”。“国务资政”英文名称叫作“Senior Minister”,其字面意思是“资深部长”。受中华文化影响的缅甸也设有“国务资政”,位高权重,现任此职的是昂山素季,舆论普遍认为,她就是“事实上的总理”。这些实际上或名义上地位崇高的“资政”,无论是否拥有实权,显然都是不能写成“咨政”的。

5. 从“资政”“咨政”的辞书收录和古文献使用情况、语义内涵来看二词的合法性与搭配习惯。

我国收词量最大的汉语语文工具书《汉语大词典》收录的词条有“资政”无“咨政”,其他严肃的语文辞书也都没有收录“咨政”这一词条。《汉语大词典》的收词原则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却不收词条“咨政”,这表明,至少在辞书的编纂者的心目中“咨政”自古至今都是不具备合法地位的。“咨政”不具备合法地位,也可以从其用例的数量上得到印证。经检索,我们在总字数超过10亿的“国学宝典”数据库获得了“资政”共有2390个结果,而“咨政”仅有23个结果。“国学宝典”数据库收录远古至民国时代的文献,号称“全球最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检索引擎”,收录文献较为全面。由此可见,“资政”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十分常用,而“咨政”一词十分罕用。在这23个“咨政”的检索结果中,其中1个结果出自民国时代的文献,把“资政院”错误地写成“咨政院”,“咨”字是形近误字。另有18个结果都不能算是词语,如“咨政理”“咨政德”“咨政典”等,都是短语,除此之外的4个结果,是作为词语的“咨政”,但它们无一不是“咨询政务”的意思,而且都是清代乾隆帝使用的,见于《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为了防止遗漏,我们又花费了一番穷搜博讨的功夫,发现最早把“咨政”当作词使用的是明人杨士奇,他在《送罗学古还清化诗序》一文中云:“学古之大父仲渊翁,……郡县礼为耆老而咨政焉。”说的是郡县的官员把罗仲渊礼聘为耆老而经常就政务问题向他咨询,“咨政”即“咨询政务”。除了出现错字的用例之外,作为一个词的“咨政”都是用于表达某人向某人咨询政务,形式通常是被助者对助人者的口头咨询;而“资政”大都是用于某一或某些历史著作、档案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某人具有帮助作用,通常是书面的或非物质的材料对他人的帮助;“资政”虽然也有口头上的,但在语义上都是表达助人者向被助者提供帮助。“育人”就是“教育人民”而让人民直接受惠,语素“育”与“人”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典型的动宾结构;“资政”就是“帮助为政”而让国政直接受惠,语素“资”与“政”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是典型的动宾结构。而“咨政”义为“咨询政务”,被咨询的政务问题无法受惠,语素“咨”与“政”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严格地说,“咨询政务”是讲不通的,“政务”不是人,怎能向它咨询?这不合逻辑。而这种不合逻辑的词语又没有像“救灾”“救火”之类的说法已经

被人民群众广泛使用而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获得了合法地位,被编入了语文辞书。所以“咨政”自古以来就极为罕见,不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不具备合法性。又因为语法结构方面的原因,我们只能将“资政”与“育人”并举,但不能将“咨政”与“育人”并举,即只能说“资政育人”不能说“咨政育人”。

四、历史等社会科学作用的准确规范表达应当是“资政育人”

综前所述,媒体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或用“资政育人”,或用“咨政育人”,我们认为,只有“资政育人”才是准确规范的,而“咨政育人”是不规范的。

新中国的历代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历史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资治通鉴》总字数达300余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对此书深有研究。受其影响撰写而成的《资政要览》《资政新篇》也都是人们熟知的历史文献。

习近平视史为师,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科书”和“最好的清醒剂”,可见他认为历史对于人们有不可或缺的帮助作用,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咨询作用,即历史的作用是“资政育人”而不是“咨政育人”。

“咨政育人”这一不恰当的写法最初源于2002年7月17日《人民日报》的发布不确,这一开始只是一个无心之过,虽属于偶尔疏忽,但影响巨大。

为此我们建议,今后的出版物一定要采用符合党和国家领导人本意的准确规范的表达,用“资政育人”而不用“咨政育人”,确保祖国语言的精准和纯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并有效发挥历史、非遗等社会科学的作用。

注释:

[1]杜玉波:《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咨政育人功能》,《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10期;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理直气壮,咨政育人——记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锡喜教授》,《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7期;徐永富:《坚持创新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共产党人》2016年第11期。

[2]龙协涛:《“咨政”乎?“资政”乎?》,《咬文嚼字》2009年第8期。

[3]孔云峰:《“资政”与“咨政”》,《重庆行政》2013年第2期。

[4]中共宁德地委党史研究室:《宁德地委作出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的决定》,《福建党史月刊》1991年第2期。

[5]胡锦涛:《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

[7]谭奇:《关于方志工作的理论断想》,载秦其明主编:《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8]习近平:《在接见全省第七次党史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载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工作年鉴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9]胡锦涛:《党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 鏊]